

编后语：增强学术志业的神圣感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终于完稿。春晓初啼，嫩声无奇，却凝聚着作者、审稿人、编辑部同人及顾问、同好的心血和期待。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个普通的出版物能够引起学术有心人的关注，能够为中国哲学研究的进一步提高略尽绵薄。

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劳思光先生专门为本刊撰写了高瞻远瞩、语重心长的代发刊辞。出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切之情，劳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哲学研究现状的忧虑。他认为，从五四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已历八十多年的光阴，却仍说不上有丰足的收获。各地华人社会中的中国哲学研究，“只有表面的热闹，实际上却正陷入一种内部贫弱，外境艰难的困局”。劳先生指出，哲学界的学人大致上是凭借某些西方特殊学派的哲学观念，来重述中国哲学问题。“他们主要的病痛，不在于运用西方观念处理中国哲学问题，而在于如此运用之前，不曾先估定那些西方观念与那些中国哲学问题本身的普遍性。缺了这一最具关键性的环节，他们的工作结果每每是一面误用了某些西方观念，一面又曲解了中国哲学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劳先生讨论分析了“以西观中”、现代性、文化主体性、客观化世界（Objectivated World）、当代新儒家的贡献与局限等概念和问题，并再次提出文化中的“开放成素”和“封闭成素”的理论区分。劳先生从事哲学与文化研究达半个多世纪，忧国忧民、慎思而敢言。此文更是厚积薄发，言近旨远，读而再读，方能深省其虑，深悟其智。

本辑的标题“反向格义与全球哲学”来自两篇文章中的主要概念。刘笑敢关于“反向格义”的文章，强调用现代或西方的既有的哲学概念来解说或定义中国古代经典固有的哲学术语常常会使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陷入两难的困境。无可讳言，西方文化是近代以来的引导性、统御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以西观中”似乎就是“不言而喻”的主流方法，然而，不言而喻却带来了盲目性，让我们忘记了去追问为什么“以西观中”是“天然”合理的，忘记了去追问“以西观中”有什么利弊得失，忘记了去审视“以西观中”如何产生杰作，如何产生败笔。文章的主旨不在于批评或否定，而是提倡方法论的自觉意识，提倡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以利突破，以利开拓。

陈汉生（Chad Hansen）是以西方语言哲学为工具研究中国古代哲学颇有影响的学者。他的研究总是能够引起较广泛的影响、关注和批评。本辑收录两篇关于他的研究方法的评论文章。方万全的〈真理概念与先秦哲学〉一文以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哲学为背景，重点讨论了陈汉生（Chad Hansen）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些重要论断或理论假设，比如说中国哲学或汉语中没有“真”、“真相”或“真理”（truth）的概念，先秦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句子和名词串等语言单位的不同，古代中文只有所谓的“词信念（term-belief）”，而没有“语句信念（sentential belief）”等。按照方氏的批评，陈汉生显然过分夸大了汉语的特殊性及其在中国哲学特点中的决定性作用。

方克涛(Christopher Fraser)的文章进一步检讨陈汉生的一些根本性的观点和论断。根据陈氏的“物质名词假说”(mass noun hypothesis)，古汉语名词的语义与英语的物质名词相类似，都是不可数的，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是一种“唯名论”(nominalism)的，因为物质名词很自然地会被解释成“分体论”(mereology)意义上的整体。方克涛指出，陈氏的论证难以成立。尽管很多古汉语名词都是作为物质名词使用的，但这未必表示它们的外延是分体论意义上的整体。最后，方克涛还提出，“语言决定思想”的理论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但这两个条件都是陈氏的论证无法满足的。

总起来看，陈汉生的研究对于推动西方哲学界以语言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而后来的批评则说明，直接用西方的语言哲学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可能很有创意，也可能有所失误。严肃的批评和讨论则有利于这种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提高。

本辑文章大多与方法论问题有关。刘昌元〈仁的当代解释〉一文对海内外关于孔子之仁的各种研究和解释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批评，他反对借助于《论语》以后的资料解释《论语》的通行作法，特别是通行的借重孟子思想和康德哲学诠释孔子之仁的弊病，进而提出“仁的整体意义”是“对真善美的感通能力和实践动力”的新解释。这种全面的反思和全新的解释必然会引起多方面的响应，甚至是激烈的反批评。我们选发这篇文章不仅希望能够推动对孔子之仁的诠释本身的进一步探讨，而且更希望提起学界对中国哲学思想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论的反思和讨论。比如，借用后人的理论观点来解释发挥前人的理论是否可行？是否必要？是否必然？是否值得提倡或批评？持赞成或反对的理论标准或实践目标何在？或许我们应该说，自觉地避免用后人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诠释前人的著作有利于贴近古代经典的“原意”，而自觉地利用后人的理论立场诠释前人的哲学观点则有利于将古人的思想拉入现实的场景和需要之中。两种作法实际用意不同，其效果也不同。无论是研究者、诠释者，还是读者、批评者对应该对这两种不同取向和用意有自觉的意识，避免研究和批评中的盲目性。

本辑另一篇涉及《论语》研究的是颜世安关于礼观念之神圣性的文章。该文认为孔子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具有神圣性，春秋中后期人类生活的神圣价值之源在于礼仪之中，而不是天道中。天道的信仰是在《中庸》、《易传》中才有明确表达的。文章的观点和材料都显示了独特的角度和功力，也引发一些来自传统或主流观点的质疑。作者以附论的形式澄清了自己的观点，并回答了同行评审中提出的疑问。关于《论语》的研究，关于“仁”与“礼”的关系有许多重要的争议和探索，本刊愿意为这方面的严肃的学术讨论提供一个园地。

吴展良关于朱熹之认识方式的文章也涉及到研究方法问题。该文强调朱熹求知读书的基本动机是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是效法圣人以合天道。因此，从西方知识论的角度来研究朱熹的认识方式难免枘凿难合。在中国哲学的本土特点和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之间的取舍、权衡，可能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课题。

郑吉雄关于戴震的文章回顾了乾嘉考据学的复杂性，特别是戴震独特的思想理趣与现实关怀，同时介绍了刘师培在戴震研究方面的开创之功。作者特别强调，戴震受困于孟子的性善论，无法提出对个人心性之恶与社群集体之恶的对应解决之道。作者的想法

似乎涉及到如何从古典思想汲取不同养分来滋养现代社会的问题。

王爱和的文章讨论中国宇宙观研究与西方理论模式的关系。作者对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宇宙观的研究的多样性和历史演变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和介绍，她希望中国研究不仅仅要运用通行的分析范畴和概念，更需要能够批判及修改现有的理论。作者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趋向或分析模式，继承结构主义的整体论和普世论，但摆脱其文化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克服“霸权”概念的单一性和统治/反抗的二分法，注重从流动的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寻找历史变革的机制。西方学者层出不穷的研究方法、角度和观点应该成为我们繁荣中国学术的助缘和参照。

本辑标题中的“全球哲学”的概念来自于安靖如（Stephen C. Angle）的文章。该文提出应该注意“研究”哲学（studying philosophy）和“做”哲学（doing philosophy）的区别，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提示。所谓“做”哲学就是创造新的哲学，而不仅是研究已有的哲学。所谓“全球哲学”的构想不是追求一个全球统一的哲学，而是要求我们致力以别人的角度去了解其它传统，并进而找出基础积极沟通、以收相互交流及挑战之效。

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术交流，本刊尝试设立一些专栏。“观潮屿”介绍研究动态，“学贤榜”评介优秀学者的成就与方法，“评书台”发表重要书籍的评论，“新叶林”则是为年轻学者开辟的园地。这些专栏是否能够成功，也有赖于学界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在学术刊物和书籍越来越多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多出一个刊物？目的何在？作用何在？简单地说，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刊物尽可能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添砖加瓦，尽可能为提高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严肃性、学术性、艺术性和创造性竭尽献芹之力。实现这种目标需要无数同行、同好的共同努力。这种努力首先不应该表现于数量的增加，而应该是质量的增强，境界的开拓，水平的提升。而这又有赖于研究者自身胸襟、志趣、以及修养的提高，不仅以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为职业、为乐趣、为谋生手段，而且要以自己的研究为志业（vocation），有一点虔敬心，多一点神圣感。本刊同人愿以此与同道共勉。（笑敢）